



BISMARCK: A LIFE

俾斯麦的一生^上

尘封信札背后的真相

〔美〕乔纳森·斯坦伯格
王维丹译

在地球上所进行的事情，
总是有一种堕落天使的特质：漂亮，却不意味着和平。
概念伟大，也付出极大努力，亦不表示成功：
骄傲，同时也孤独。

——俾斯麦

B
I
S
M
A
R
C
K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俾斯麦的一生

尘封信札背后的真相

(上)

〔美〕乔纳森·斯坦伯格
王维丹◎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俾斯麦的一生：尘封信札背后的真相 / (美) 斯坦伯格著；王维丹译. --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11
(历史名人传记)

ISBN 978-7-212-05917-0

I. ①俾… II. ①斯… ②王… III. ①俾斯麦, O. (1815 ~ 1898) — 传记 IV. ① K835.16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0328 号

安徽省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 字：12121142

BISMARCK: A LIFE by JONATHAN STEINBERG

Copyright © 2011 by Jonathan Steinber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Beijing Time-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俾斯麦的一生：尘封信札背后的真相

作 者 | [美] 乔纳森·斯坦伯格

译 者 | 王维丹

出 版 人 | 胡正义 周殿富

出版监制 | 陈丽杰 李 争

出版策划 | 李凤琴

责任编辑 | 陈丽杰 李凤琴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装帧设计 | 尚书堂 段文辉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010-8733105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34

字 数 | 54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5917-0

定 价 | 69.8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俾斯麦的“自御”

奥托·冯·俾斯麦缔造了德国，但从未统治它。他曾是三位皇帝的臣子，却没有任何一位帝王可以随时解除他的职位。1890年3月，有一位皇帝这么做了。那一次，俾斯麦的公开讲话缺少了所有我们通常称之为魅力的特质。而就在1878年9月俾斯麦个人权力与名誉达到巅峰的时候，当时的一家报纸《施瓦本商业之神》(Schwäbische Merkur)还这样描绘俾斯麦在德国国会的一次讲话：

那些第一次听到他演讲的人要多么吃惊啊。他的声音并不算洪亮有力，语音之中没有预料的那样悲痛，语速也不像传统的雄辩方式那样激情洋溢地滔滔不绝。相反，他吐词轻松舒缓，口气像日常对话，有时稍

作迟疑，迂回前进，直到自己找到正确的词语或者词组，再精确地推出恰如其分的表达。一开始，听者简直就会认为发言的人是感到尴尬。他左右摆动自己的上半身，从身后的口袋掏出手帕，擦擦眉毛，又放回口袋，然后再一次把它拽出来。

俾斯麦从未在公众大会上讲话，只是在他卸下高位以后才吸引到民众的目光，那时他俨然已成为一代传奇人物。

1862年9月至1890年3月，俾斯麦一直在德国发号施令，职位却仅仅是在议会频频露面的一名部长。从1847年起，他就一直在多种议会的机构发表上述这类演讲，直至1890年离职。尽管向听众释放着如此强大的个人魅力，俾斯麦却从未领导过英国人概念中的任何一支政治党派。纵观俾斯麦的职业生涯，无论是德国保守党、国家自由党，还是天主教中央党，这些德国最大的政党都不信任他，与他保持距离。俾斯麦所属的党派是所谓的“自由保守党”，它的成员很有影响力，但它在内阁以外却没有大批追随者。俾斯麦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都致力于政府管理的具体事务。从处理各项国际条约到确定邮政汇票是否收取印花税，他打点一切，事无巨细。很奇怪的是，印花税问题倒成为俾斯麦多次辞职的原因之一。

俾斯麦没有军界的资历。他服役时间很短，年轻时很不愿被编入后备役部队（实际上，他试过逃兵役，但他的官方记录省略了这段不光彩的过去），而他能让那些“真正的”士兵们尴尬或是愤怒的只有那些他经常穿的军装。被冠以“神人”称号的毛奇元帅世家有这样一位家族成员——中校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他曾在1870年写道：“那位身着法国胸甲骑兵马甲的公务员日复一日越发厚颜无耻了。”

俾斯麦的名字之中一个“冯”，这个古老的普鲁士姓名代表着一个“好”的家庭出身。但历史学家特莱齐克1862年撰文透露，俾斯麦显然就是个“浅薄的乡绅”。他为自己的社会等级自豪，但也心知肚明，很多人都比自己的等级高。一名俾斯麦内阁成员回忆了这样一个例子：

大多数正式商议都是首相发起的……哈慈菲尔德（Paul Count von

Hatzfeldt-Wildenburg)也会一同交谈。因为在首相眼中，他的社会地位最高。其他内阁成员通常保持沉默。

俾斯麦和自己的兄长继承了田庄，但都算不上富足。他仕途生涯中多数时候不得不一直降低开销。在那个朝廷与权臣占据着政治生活与阴谋核心的社会，俾斯麦待在家中早早吃晚餐，过着不入流的生活。在从政晚期，他大部分时间都尽可能远离柏林。

1918年，在俾斯麦的权力帝国开始崩塌之时，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在一篇名作里质疑，为什么我们要服从国家的权力。他将权力分为三种形式，把它们称为“合法性”。其中第一种是：

“永恒的昨天”权力，即更近于神圣的权力。难以想象，古老的认知与惯性的导向就能使人服从它。远古时，族长与世袭君主行使这种传统的支配权。

第三种权力是：

以“合法性”支配，因相信法规有效、也相信基于理性制定的规则能发挥功能受支配。

但第二种权力才是韦伯对我们理解政治作出的最大贡献，他这样定义这种有“魅力”之称的权力有如下合法性：

有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权力。它是个人的迷人天赋(魅力)，是一种绝对的个人投入，展现个人信心、英雄主义或者其他个人领导特质。有这种魅力的支配权由预言家或——政治领域——被推选出的军阀、公投获胜的统治者、煽动人心的政治家或是政党领袖行使。

上述定义没有一种能全面展现俾斯麦的权力。作为一位忠诚的皇室仆人，他符合韦伯的第一类权力定义：他的权力建立在传统，即“永恒的昨天”基础上。俾斯麦身为首相，是政府的头号管理者，他多数时候都行使着韦伯定义的第三类

权力：因“合法性”而支配……以理性制定的规则为基础。他的“魅力”与我们传统意义上感受到的不同。

尽管如此，由于俾斯麦的控制太严苛，生活在俾斯麦掌权时期的同代人在自己的书信与回忆录中提到他反复用到“暴君”与“独裁者”这样的字眼。俾斯麦解职后，比他年轻4岁的克洛德维希·冯·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亲王(Prince Chlodwig von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此后曾接任首相一职。他这样描述俾斯麦卸任几个月后自己有一次拜访柏林的景象：

在此地三日来我留意到两件事：第一，没有谁像以前那样匆忙奔波了，第二，有个性的人看来更多了。拥有独立个性的个体意识到了自身价值。从前，由于俾斯麦亲王的影响力占据支配地位，这些人都受到压制和限制。而现在，他们的个性完全释放，就像放进水中的海绵那样膨胀。

我发觉，需要一个新的词组解释俾斯麦其人其事。俾斯麦纯以自己的个性之力指挥着身边的人，从未握有王权，却拥有某种驾驭自我的能力——“自御”。正如威廉一世评价的：“做一个统御俾斯麦的君王实属不易。”在俾斯麦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极度展现的个性有多么伟大，又有多么不幸。俾斯麦曾经对德国国会的速记员大发雷霆，只是因为他们记下了1878年9月4日的国会争论内容。一个月后，他向助手莫里茨·布希(Moritz Busch)吐露自己背地里怎样怀疑。布希记载如下：

在记录我过去的那些演讲时，速记人员成心作对。只要我还受欢迎，就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他们对我说的断章取义，那些话毫无意义。他们听到左派或者中间派嘀咕了什么，会记下原话，但省略了说那些话的人是“左派”。而对于中途响起的掌声，他们就想不到要记录下来。整个官僚系统的作风都是如此。我已经向总统诉过苦。这让我不舒服，就像是因为抽烟太多生了病，我的脑子一团乱麻，头晕目眩，想要作呕，出现了诸如这类的病症。

想一想这样的证据，任何一个正常人是否会当真以为，速记员在德国国会那些气氛沉闷的走廊里策划这样一起阴谋，有可能扳倒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这

会让人生病吗？忧郁症很难合理解释这样的抱怨。中校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对此毫不怀疑：1870年12月7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袒露心声“俾斯麦开始真的为进疯人院做准备了。”但俾斯麦永远不会去那种地方。即使担心害怕，他在自己40岁到70岁这段时间里还是正常无恙，身强体健。他主持内阁28年，彻底改变了自己所处的世界。在19世纪，除了身兼帝王与元帅于一身的拿破仑，再没有哪个欧洲人能像他那样掀起天翻地覆的变化。俾斯麦做到了，而他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元帅。

因此，在讲述奥托·冯·俾斯麦生平成就时，本书会指出原因不在于他行使了机构、社会大众或是“外力 and 外因”赋予的权力，而是源于他个人展现了力量。这种力量的基础是驾驭一个非比寻常的强大自我。这恰恰颠覆了人性发展史上对权力的确切定义。在此，我的意思是肢体演示、演讲模式、面部表情、思考与行动的风格、美德与恶行、意愿与野心这些综合在一起，此外还要加上特定的一些个性化的害怕、逃避，以及行为的心理模式。这些才是我们认定为“人”的特质，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创造后又掩盖的自我。它让别人了解我们。俾斯麦某种程度上比他周围的人拥有更复杂的多面性。而所有认识他的人——无一例外——都证实了自己受到一种魔力的牵引，这可以说成是吸引力。即使是那些恨他的人也并不能对此否认。他的文字有一种魅力，行文不拘章法，传递着足以产生催眠效果的诱惑力。这样的力量来自他强大的自我，人们会从中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的俾斯麦。

只有传记才会极力捕捉上述力量的特性。这本传记试图描摹并诠释一位政治家的人生。他经历三次战争一统德国，成为普鲁士文化中残忍与冷酷的代表。而现实中的俾斯麦性格复杂：忧郁却又倔强，蛮不讲理、专断独裁却又很容易流泪。他明明皈依了基督教里有极端倾向的支脉福音派，却促成了学校的世俗化和民事离婚。在政治生涯达到一个特定的阶段后，他总是在公众场合身穿军装，但他从未在普鲁士国王的正规军中服役，这在他的同胞中少之又少。与俾斯麦同为容克的贵族都不相信他，认为他太过精明，太不沉稳，太难以捉摸，不算符合正统标准的胜利者。但那些贵族又一致认为他很有头脑。出身辉格党贵族名门的奥多·罗素(Odo Russell)在1871年至1884年间出任英国驻德国大使。他曾于1871年给

母亲写信时提到俾斯麦：“他内心的恶魔比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人都强大。”特奥多尔·冯塔纳是与俾斯麦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在德国文坛，他享有的地位就如同英国文学界的简·奥斯汀。1884年，冯塔纳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俾斯麦打下喷嚏或者说声干杯时的祝福语都比一群改革派宣讲高明的大道理更有意思。”而到了1891年，当俾斯麦卸任失势之后，冯塔纳又在给好友弗里德里希·维特(Friedrich Witte)写信时这样评价俾斯麦下野：“并非源于他的政治错误——只要形势还在变化，都是很难确定的——而在于他的个性失败。这位巨人天性中有渺小的一面，他的落败就是因为其渺小的这一面。”

俾斯麦还是一种少见的生物。他是“一个政治天才”，能操纵自己所处时代的现实政治。他通常即兴演讲，他的政治分析甚至能取悦自己的一些敌人。最终受到俾斯麦撤职处分的陆军上将阿尔布雷希特·冯·史拓诗(Albrecht von Stosch)就看到了他性格中的这两方面。1873年，他致信当时的威廉皇储时写道：

目睹我帝国首相全情投入精神活动，微臣再度感受其魅力。但凡为帝国抵御普鲁士排他主义之大任降临之时，他驰骋飞扬的思想就可以化作锋芒毕露的利器。

而史拓诗在那多年前还记叙过一段与此截然不同的经历：

几天后俾斯麦召见了。之前，我是他的一个崇拜者，崇拜他的高智商和旺盛不竭的精力。只要我还能在他努力与亲王妃殿下达成一致的过程中占有一定的重要性，我就能享受最高的礼遇，得到极高的重视。而现在，我不得不体会到，自己只是他的众多助手之一。他让我坐下，翻阅我的报告，那感觉就像校长在检查学生的功课，而且这个学生既没头脑又特别调皮……俾斯麦喜欢让手下感受到自己的权力。他们的成绩总是他的。假如下属出了错，即使是按照他的指示行事，也要受到他的责怪。当萨克森州的协议遭到民众公开抨击时，他就说在协议签订以前从未看过协议。

1870年德国统一之后，怀有爱国心的德国人普遍相信俾斯麦是政治天才。我

认为，在他1862年担任普鲁士首相时，其实几乎没有谁会这么想。而远在此之前，在普鲁士国王的政府中，有位身居要职的大人物就看出了这点。那就是1859年至1873年任陆军部部长的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lbrecht von Roon)。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俾斯麦还是弱冠少年，罗恩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不寻常的人身上有某种伟大的气质。1858年12月4日，他第一次在表达对俾斯麦的看法时有了听众，对方是当时的摄政王、普鲁士未来的国王。那时罗恩将接受陆军部的任命，他借机促请摄政王任命俾斯麦为首相。也正是罗恩于1862年9月18日发出了那封闻名后世的电报：“险情拖延。速回！(periculum in mora. Dépêchez-vous!)”他向俾斯麦发出了信号，预示着他命运攸关的时刻已经到来。

波恩大学法学教授、新教的“内在使命”说创始人克莱门斯·特奥多尔·佩莫瑟(Clemens Theodor Perthes)是罗恩最好的朋友。1864年4月，他为俾斯麦任职一事斥责罗恩，称这位好朋友策划任命的是一个“非常冷酷地算计、狡诈地谋划的人，此人做事不择手段”。罗恩对此回应道：

俾斯麦绝非常人，我当然会出手相助此人，我会给予支持，在一些方面做出校正，但从来不会取而代之。的确，没有我，他不会身处现时的高位，那已经是历史现实，但即使有了这一切，他还是他自己……如果要从对角线的角度，即是说已经发生的角度正确构筑力量的平行四边形，然后评估有效力量的特性和施加的重量，而这些力量又是不可能确切了解的，那么就要由史上少有的天才将一切合为一体，以此进行确认。

而俾斯麦做的正是——“将一切合为一体”。

但仅有天赋的才华也不可能赢得权力。俾斯麦当年名声不佳，风评他为人绝不可靠，夸夸其谈耍小聪明，观点还极为反动。若没有一位理性的君主——年届65岁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知人善任，有多年历练——对他委以大任，他也只会走入绝境。威廉一世的兄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8年留下手谕：“俾斯麦其人——唯有毫无限制地以刀剑治国之时方可起用。”但到了1862年夏，普鲁士议会与摄政王就军队改革陷入僵局，开始令王室统治阶层恐慌。1848年革命时期的暴乱景象重现柏林街头，朝野上下都焦虑起来。就像自由派人士马克斯·东克尔

(Max Duncker)所写的：发生暴动后军队群情涌动，“如同鹿切慕有水的溪河”（《旧约圣经》“诗篇”第42篇第1节）。

俾斯麦凭借个人的实力与才智获得并把持权力，但他一直仰仗着国王的美意成全。1862年9月底，俾斯麦发表了“铁与血的讲话”，遭到德国皇族与国内高知们的集体谴责，面临千夫所指的惨败。假如那时威廉一世决定辞去他的职位，俾斯麦从此就会从史书上消失，德国的统一几乎必定以一些自治省自愿联盟的形式完成。1867年，假如威廉一世在《圣经》上称为一生寿命终了的古稀之年就驾鹤西去，那么俾斯麦一手缔造的北德意志联邦可能最终会吸纳南德意志的那些小王国，但不会经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而弗里德里克三世皇帝/国王与他那积极主张自由主义的妻子——英国公主维多利亚可能会开启一个“自由时代”。我们都知道弗里德里克三世1888年希望任命的那一串部长名单，当时他已是行将就木之人。这些人选都是自由派。对俾斯麦而言，起用这些人意味着成立英国体系的议会制政府，限制皇权，结束他的个人专权。即使性格强势的新皇弗里德里克三世身体康健，无论他是否会抵制俾斯麦，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长女维多利亚公主也无法忍受君主专制和俾斯麦的专权。于是势必发生一场大冲突，俾斯麦难免罢官的命运。德国随后可能就追随英国的自由议会统治模式。我们现在可以这样推断，因为当事人那时就是这样承诺的。威廉一世没有在70岁高龄时故去，也没有在耄耋之年的门槛前止步，而是迎来了91岁高寿，于1888年阖然长逝。年迈皇帝的长寿让俾斯麦能执掌内阁26年之久。

这26年间，俾斯麦要么发脾气，要么流眼泪，有时歇斯底里，有时威胁强硬，一次又一次地迫使国王为他网开一面，做那些普鲁士皇权体制拒不接受之事。这26年来，俾斯麦向贵为国王的老人施展他个人的魔法，得以掌握发令权。俾斯麦的政治生涯以他的人际关系网为基础——那些与威廉一世和陆军部的相关人士私交尤甚——也离不开其他的外交官、独立国家的国君与朝臣。从俄国沙皇、威廉一世到继任的德国皇帝，他们统治国家的支柱部分是成文的宪法规定，部分则是真正的普鲁士传统。这些传统来自蒙主恩典的新教，那是普鲁士的上帝。俾斯麦无需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支持，也无需依赖政党，他只需要一个公开的代表。当这个代表改变时，比如弗里德里克三世奄奄一息在位的那短短19天，

又比如不安分的蠢蠢欲动的威廉二世继承王位后，俾斯麦的好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1890年3月20日，威廉二世撤了他的首相职位。俾斯麦就像当时一幅名为“重击”的漫画展示的那样：飞机驾驶员从高空直线坠落。

但人和权力存在于现实世界，正如俾斯麦所说，一位政治家不会创造时间流，而会漂浮其上，努力掌舵领航。俾斯麦就在政治的现实局限范围内掌握方向。他常常将政治定义为“可能性的艺术”。读者需要了解语境、文字描述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政府及其领导者、经济与社会变化。这些将欧洲转变为人类第一个“现代”社会，就发生在俾斯麦生活的年代。天赋指引他发现了19世纪60年代的国内与国际力量有哪些可能的布局，这让他能统一德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德国从奥地利的版图中分离出来。他采取了大胆的行动，愚弄自己的同代人，可他又很长寿，所以被那些不可预见的后果所害，成为了牺牲品。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这一类后果有如下准则表述：

首先，偏见在远程操作过程中可能表现得优异，这种优秀可能源于最初产生的副作用。相反的情形也会发生：看来非常合理的方案，开局也很讨喜，结论通常让人感到可耻又可悲。

1863年，为了避免威廉一世参加奥地利国王召集许多君主举行的会议，俾斯麦心生一计，让震惊的德国民众进行普选做出决定。这个计策果然奏效，奥地利的行动失败了。普鲁士统一了德国，广泛的人民普选成为新的德国国会——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下议院的特权。从1870年到俾斯麦失势期间，他的人生经历是伯克上述准则的真实写照。到了1890年，“很讨喜的开局”在俾斯麦看来已变成“可悲的结论”。德国已经工业化，出现了新兴的工人阶级。他们怀有敌意，怒火难熄。天主教徒幸免于宗教迫害，他们贡献了议会党派的大多数选票。按伯克那富有讽刺意味的推论，所有的选票都会投给议会的社会党人与天主教人。到1890年，俾斯麦1863年的睿智创意使议会开始出现他称之为“德意志之敌”的议会多数派。截至1912年，俾斯麦口中的“敌人”——天主教徒与社会党人合计占据了国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俾斯麦1863年时策划普选是为了阻挠奥地利的行动，以及动摇少数德国境内小王国的合法性。此后却得出了立法机构陷入困境的“可悲结论”。后世政治家因诺

克·鲍威尔(Enoch Powell)曾评价称,“一切政治生涯都以失败告终”。

俾斯麦的一生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反映了上述问题,还体现出一个更普遍的问题。俾斯麦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在运用权力时自身的力量与弱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伟大的人类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最高政治权力从未有永久的专属人,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始终在变。既然俾斯麦是史上最伟大的一位政治人物,自然会有各类描写他的传记。为他做传的作者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清单,赫赫有名者甚众:埃里希·艾克(Erick Eyck)、A.J.P.泰勒(A. J. P. Taylor)、维尔纳·里希特(Werner Richter)、埃德加·福伊希特迈尔(Edgar Feuchtwanger)、爱德华·克芮恩克肖(Edward Crankshaw)、奥托·弗兰兹(Otto Pflanze)、罗塔·伽尔(Lothar Gall)、恩斯特·恩格尔贝格(Ernst Engelberg)与凯瑟琳·勒曼(Katherine Lerman)。J. C. G. 勒尔(J. C. G. Röhl)的鸿篇巨著则展现了俾斯麦卸任之后威廉二世及德国的发展史。连俾斯麦的老对手——天主教徒温德霍斯特(Windthorst),也有玛格丽特·拉维尼亚·安德森(Margaret Lavinia Anderson)的研究文字传世。其他与俾斯麦有关的专著还有几十本。宾州大学凡·派特(Van Pelt)图书馆列出了201部标题中含有“俾斯麦”的作品。本书与此前这些著作有何不同?它有别以往之处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目的,二是方法。其目的在于,举重若轻地表达及完成或许不可能做到的事:向作者及读者解释俾斯麦怎样运用其个人的力量。其方法在于,让那些权力影响的对象:朋友与敌人、德国人与德国以外国家地区的人、年轻人与老年人,即具体感受到俾斯麦的性格力量并记叙了这种影响的所有人。在叙述中,我已经改变了评论与证据之间的传统平衡,更倾向于证据。我希望让许许多多见过俾斯麦的名人打破长久的沉默,回顾他们对俾斯麦的所见所闻。俾斯麦大学时的好友美国人约翰·洛斯鲁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这样向威廉·罗素女士(William Russell)解释有关俾斯麦的历史研究:

我每天去自己的档案库,查阅页眉为17世纪的文件……这真有意思……像是从停尸房里取出枯骨,然后试着嗅一嗅它们的气味,虚构它们负载的人生故事。和“魔鬼罗伯特”(Robert the Devil)一剧第三幕里罗伯特的父亲贝特伦一样,我也喜欢摆弄那些亡故人,设置他们的动作,

再次让他们干傻事。

我的“那些亡故人”没有做糊涂事。他们告诉我俾斯麦是谁，他们又是谁，还常常印证我对俾斯麦另一位同代人的观点，表达出我自己原有的看法。

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比如陆军部长罗恩举荐俾斯麦入阁时也了解他这个人。我推测罗恩的想法是：我不会让他那些死板的反动观点进一步发展，但他那世人少有的清廉与正直打动了我。而让我吃惊的是，我后来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证实了自己对罗恩的猜想。那是希尔德加德·冯·斯皮茨恩伯格(Hildegard von Spitzemberg)在1892年8月7日记下的一篇日记，记叙了她读到罗恩刚出版的个人回忆录(Denkwürdigkeiten)，其中这样评价俾斯麦：

这个人真是虔诚、正派又有能力。他那么地忠诚，又那么坦率。你可以觉察到，他不得不忍受那些高层和最高层人物对他的诸多冒犯，也可以看到他笔下的旅途多吸引人，他与妻子的爱情、与佩莫瑟和布兰肯堡(Blanckenburg)的友情多么动人。

我与斯皮茨恩伯格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身处不同的世界。一个是21世纪的寻常学界中人，一位是19世纪的上层社会贵妇，却在俾斯麦身上发现了同样的性格品质。我由此受到鼓舞，要以俾斯麦那些同代人的体会为基础，自己去“感受”俾斯麦的个性。

日记还带给我另一些特有的快乐。克里斯托弗·蒂德曼(Christoph Tiedemann)的日记里写到自己1875年与俾斯麦第一次共进晚餐，我还顺便侧面了解到19世纪70年代的卫生间如何布局：

1月25日真有意义！这天下午5点到晚上11点都在俾斯麦家……俾斯麦亲王抱怨胃口不好。敬礼！我希望他恢复好胃口。他每道菜都尝了两次，然后埋怨菜做得不好。亲王夫人就极力反对，她很喜欢吃那道猪肉做的肉冻。亲王只是抵了点葡萄酒，但喝了不少啤酒，都是用银质的大酒杯来装……

大概7点半的时候，亲王邀请我和西比尔随他看看他的书房。防范

起见，他先带我们去了书房隔壁的卧室，让我们在那里方便一下。我们在床底下找到了两样东西，尺寸很大。我俩靠着墙，西比尔发自内心地感叹：“这个人的一切都那么伟大，连他用来小解的家伙也那么大块头！！”

但最有力的证人还是俾斯麦本人，因为他笔耕不辍长达60载，仅正式作品集就有19部之多，全是四开本，平均每部500多页。在第六部作品集中，有438页收录的都是1871年至1890年他呈报皇帝的报告、口述的记录和其他官方文件。俾斯麦与家人、朋友和其他人的书信有数千封。他负责国内外政策达28年，因此他的官方文书与通讯录内容包罗万象，从威胁俄国开战到国内烟草垄断，范围很广。看上去他已经让自己的职业变成了要无所不知的行当。结果是，他要起劲地立即消化材料，同时还要留下大量的文字记录。克里斯托弗·蒂德曼是俾斯麦的第一位私人助理，从1875年到1880年期间从事这一工作。他在日记中记录了随俾斯麦一起参加的一次会议。那是典型的工作会议，地点是俾斯麦在瓦尔津(Varzin)的乡村别墅：

昨天我在他的书房呆了两个半小时。他整个下午都在口述一封呈给皇帝的信——共有32对开页，没有停顿一气呵成。他不仅准确地叙述了就他加入内阁一事与班杰森(Bennigsen)的谈判内容，同时也从政治角度高屋建瓴地勾勒出引进宪法依赖整个政党系统的发展。亲王不停歇地说了5个小时，我也重复了这么长时间。他的语速一般都比我快些，我几乎赶不上他的思绪。屋里太热，我开始大汗淋漓，觉得自己缺水，快要抽筋了。然后，我就很快做了决定，一言不发地脱掉了外套，把它扔到椅子上。亲王来回踱着步。看到我这样，他起先还有点惊讶，但接着就朝我点点头表示理解，继续不停讲下去。

岁月不饶人。年岁一渐长，如此繁重的工作就让俾斯麦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容易发脾气。这给那些与他合作最密切的人敲响了警钟。罗伯特·卢修斯·冯·巴尔豪森(Robert Lucius von Ballhausen)1870年加入俾斯麦的工作圈子，

1879年以后成为普鲁士内政部的一名内阁大臣。他经常见到俾斯麦本人，对这种精神状况恶化也有记录。早在1875年，巴尔豪森就在日记里越来越感到担忧。以下两则就是：

2月22日：这是俾斯麦突出的一个性格特点。他脑子里激荡着复仇的大潮，要向那些折磨自己的真实或假想的怠慢行为展开报复。因为这种病态的易怒情绪，他会误解别人，实际上对方本意从未如此……这是一个很惬意的晚上。吃晚饭时，俾斯麦自己用刀把半只火鸡切成薄片，作为下酒菜。他喝的酒是法国白兰地，有1/4或者半瓶那么多，里面混合了两到三瓶的阿波里那矿泉水。那天他说什么都喝不下，对啤酒和香槟都没兴趣，只有白兰地和矿泉水混起来最合适。他坚持要我也陪他喝，所以我没发现他喝了多少。

3月4日：国内形势瞬息万变，复杂多样……俾斯麦以他个人的角度处理一切问题。显然这其中大部分都保留了他的影响和他那一天一变的想法。他自己不想做事的时候，就用皇帝陛下的意志做挡箭牌。大家都知道，只要他真想做到，就会用尽一切方法达到目的。

这是一个丝毫容不得异议的人。他将观点分歧视为不忠，从未忘记受到过的任何伤害。想象一下，要怎样努力才能统领这样的人？俾斯麦年轻时做过外交官。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坦(Friedrich von Holstein)曾经是他那时的崇拜者。霍尔斯坦后来的如下描写透露了他的崇敬之心已然幻灭：

对俾斯麦来说，折磨、催促、虐待人才能让他感受到大权在握，这是必不可少的心理需要。他对生活的悲观看法由来已久，那剥夺了人类的一切快乐，只剩下一一种娱乐消遣的来源。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被迫承认，俾斯麦的统治是肆无忌惮地不停蔑视和辱骂具体某些人和整群人。这种趋势也导致俾斯麦亲王犯下一生中最大的那些错误。在这方面，他的直觉受到个性的奴役。这也证明了他发脾气的理由都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

而这位“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对此只会部分表示同意。以上是霍尔斯坦1906年后写下的文字。那时他还孤身一人，身为高级公职人员，他受到制定外交政策的机构所迫才如此怨愤。霍尔斯坦对德国国情及所处环境深感绝望。他从1861年起认识俾斯麦，一直很熟悉对方，曾经爱戴俾斯麦。即便如此，这位未来的历史学家也必须承认，俾斯麦已经变得粗俗，霍尔斯坦发现其他人也意识到了这点。但在外交事务方面，我认为，俾斯麦从未像他通常处理国内事务那样——丧失理智，怒不可遏。在外交领域，他变成了囚徒，受制于自己无法控制的那些力量，但又可以完全理智地行动，始终尽其所能仔细地处理事务。这位外交高手从未丢下自己的看家本领。国内事务方面，虽然俾斯麦在引进现代事故、残障与老人保险系统期间也显示出睿智与远见，但又因为他个人对社会主义的恐慌与仇恨蒙蔽了双眼，无视其他的社会问题。在开始回顾俾斯麦的人生经历之时，笔者与读者都不应过早地判断霍尔斯坦的指控是否公正，而应承认我们必须面对一位人类史上最有趣、最有天赋又最矛盾的人物。